

WINTER
No. 10 / 2018



Political Philosophy Review

寻访马克思

复旦政治哲学评论

洪涛 主编

第10辑

2018年

本辑专题：寻访马克思

青年马克思共产主义观念的形而上学基础 / 吴 猛

作为理性批判者的康德和马克思 / 英德利希·采伦 著 张 广 王兴塞 译

马克思政治现代性批判的先导

——读《论犹太人问题》 / 刘 洋 李 洋

生产劳动：理解马克思工人阶级理论的核心概念 / 李锦峰

卡尔·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 / 汉娜·阿伦特 著 陈高华 译

非
外
借

上海人民出版社

WINTER
No. 10 / 2018



Political Philosophy Review

寻访马克思

复旦政治哲学评论

洪涛 主编

第10辑

2018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访马克思/洪涛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第10辑)

ISBN 978-7-208-15461-2

I. ①寻… II. ①洪…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5897 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封面设计 王小阳 夏 芳

复旦政治哲学评论 第10辑

寻访马克思

洪 涛 主编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21
插 页 4
字 数 248,000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461-2/D·3284
定 价 88.00 元

《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第10辑 / 2018年
Fudan Political Philosophy Review, No.10/2018
主办单位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主编：洪涛

学术委员

汪晖（清华大学）
赵汀阳（中国社科院）
何怀宏（北京大学）
万俊人（清华大学）
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
陈来（清华大学）
郭齐勇（武汉大学）
林尚立（复旦大学）
桑玉成（复旦大学）
顾肃（复旦大学）
陈明明（复旦大学）
刘清平（复旦大学）
张汝伦（复旦大学）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
姚大志（吉林大学）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
俞可平（北京大学）
李强（北京大学）
钱永祥（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萧高彦（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慈继伟（香港大学）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学）
Daniel Bell（清华大学）
包利民（浙江大学）
应奇（华东师范大学）
郁建兴（浙江大学）
秦亚青（外交学院）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
张小劲（清华大学）
任剑涛（清华大学）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
唐文明（清华大学）
曾亦（同济大学）
白彤东（复旦大学）
洪涛（复旦大学）
丁耘（复旦大学）
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
刘训练（天津师范大学）
熊文驰（上海外国语大学）
刘晨光（中共中央党校）

目 录

本辑专题 寻访马克思

青年马克思共产主义观念的形而上学基础 /吴 猛 3

作为理性批判者的康德和马克思 /英德利希·采伦 著

张 广 王兴赛 译 32

马克思政治现代性批判的先导

——读《论犹太人问题》 /刘 洋 李 洋 51

生产劳动：理解马克思工人阶级理论的核心概念 /李锦峰 64

研究论文

中文“国家”一词的多重语义辨析 /刘清平 83

古今之维：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洪 涛 97

思想史研究

李维论自由与品级之争 /韩 潮 147

为“利维坦”而战？

——霍布斯思想中的战争权、士兵义务与人性基础 /郭悠乐 185

康德历史哲学在历史哲学史中的位置 / 维托里奥·赫斯勒 著

邢长江 译 赵培楠 校 223

国学专论

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董仲舒“春秋决狱”的“忍杀”一面

——西汉中期淮南、衡山之狱探微 / 武黎嵩 247

评论

另一种人文主义：从西塞罗到塔西佗

——读理查德·塔克《哲学与治术》 / 郁 迪 263

经典与诠释

卡尔·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 / 汉娜·阿伦特 著 陈高华 译 277

本辑专题
寻访马克思

青年马克思共产主义观念的形而上学基础

吴 猛*

〔内容提要〕 在当代左翼思想家们的讨论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中往往被片面化理解。事实上,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转向”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念的形成与其特定的形而上学立场相关,这一立场就是,有限性与无限性具有统一性。由于马克思所面对的有限性总是具体的有限性,因而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方式也总是具体的。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形而上学基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无法被分割为与“经济”有关的部分以及与“政治”有关的部分,更无法被片面地用某种“价值”加以概括。

—

进入 21 世纪以来,西方左翼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的动向,就是对“共产主义”问题的持续关注。巴迪乌(Alain Badiou)和齐泽克(Slavoj Žižek)曾在 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连续三年分别在伦敦、柏林和纽约组织学术会议,讨论“共产主义”问题。而作为欧洲左翼思想重镇的《今日马克思》(*Actuel Marx*)杂志也围绕“共产主义”问题组织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比岱(Jacques Bidet)、奈格里(Antonio Negri)等重量级思想家进行了专题讨论。

引人瞩目的是,共产主义思潮的此次“复兴”,带有鲜明的当代左翼政治哲学特征:“共产

* 吴猛,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主义”基本上不再被理解为某种“社会理想”和“社会制度”，而是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观念”。尽管作为这次大讨论的发起者之一的巴迪乌将“共产主义观念”理解为“一种关于平等的纯粹观念”^①并未被思想家们一致接受，但他的如下说法却基本体现了当代左翼思想阵营的共识：“‘共产主义’一词既不是在傅立叶意义上的乌托邦观念，也不是像恩斯特·布洛赫在其有趣的著作中所认为的那样的调节性观念。‘共产主义’所指称的，是一种在总是具有特殊性的现实政治过程和被纳入这一过程之中并总是具有个别性的个人之间的一种必要的中介”。^②按照这种看法，共产主义观念被理解为一种将个人与政治过程联系在一起的观念。关于与共产主义相联系的“政治过程”的含义和作用，以及个人之与政治过程建立起联系的方式，人们的理解各各不同。比如，在巴里巴尔看来，这种政治过程就是国家走向其对立面的过程，而共产主义观念则内在于以“国家的非国家化”为方向的民粹主义中^③；而在奈格里那里，与共产主义相联系的政治过程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反抗剥削的斗争，真正的共产主义观念则是劳动者在劳动中所生成的“共同性”观念；^④而对比岱来说，共产主义是现代社会的“元结构”所必然导致的阶级斗争的产物，具体说来，乃是被裹挟入市场和组织之内的“基础阶级”的“霸权性视角”。^⑤尽管存在上述差异，这些思想家却一致将自己关于共产主义问题的理解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巴里巴尔

① 阿兰·巴迪乌：《共产主义假设》，罗久译，吴猛校，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8）》，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② Alain Badiou, “Le socialisme est-il le réel dont le communisme est l’idée?” In Alain Badiou et Slavoj Žižek (ed.), *L’idée du communisme II*, Lignes, 2011, p.10.

③ 参见 Étienne Balibar, “Remarques de circonstance sur le communisme”, in *Actuel Marx*, N°48, PUF, 2010.

④ 参见 Antonio Negri, “Est-il possible d’être communiste sans Marx?” in *Actuel Marx*, N°48, PUF, 2010.

⑤ 参见 Jacques Bidet, “Le communisme entre philosophie, prophétie et théorie,” in *Actuel Marx*, N°48, PUF, 2010.

强调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超越”的思想，奈格里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区分为“科学性”的方面和“战斗性”的方面，并将自己的理论与后者联系在一起，而比岱则认为自己的元结构的共产主义理论所继承的正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这样，在某种意义上，共产主义的“当代复兴”实际上可被视为对十月革命以来“现实社会主义运动”之普遍从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层面上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这一做法的“反动”，即一方面不是从制度，而是从观念的角度来理解共产主义，另一方面不是从经济而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共产主义。但问题是，在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问题的经典表述中，如在《哥达纲领批判》的讨论中，他固然并没有认为共产主义仅与经济制度有关，显然也并未将共产主义问题简单归于政治或政治斗争问题。事实上，尽管西方左翼思想家们基本上不会反对奈格里的“没有马克思，我们不可能谈论共产主义”^①这一判断，但这里的马克思却显然是一个被片面理解甚至被有意曲解的马克思。上述思想家们共同接受的一个做法是，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成果切割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分析，另一个是关于在这一结构中所产生的组织性力量及其对抗性力量的分析，并进一步将前者视为马克思本人所着重阐发的方面，而将后者视为马克思所忽视或将之归入前者的方面，因而将阐发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示的政治维度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内容。这一点在比岱的“元结构理论”被明确提出并为包括巴里巴尔等人所赞同。

从当代西方左翼思想界所面对的“现实境遇”来看，强调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政治维度自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一系列超出马克思视野的新变化，世界范围内的反抗运动出现

^① Antonio Negri, “Est-il possible d’être communiste sans Marx?” in *Actuel Marx*, N° 48, PUF, 2010, p.54.

多元化特征,仅仅从经济制度方面来理解共产主义问题显然已不合时宜。但一个被刻意片面理解甚至曲解的马克思,固然可在某些方面为当代思想者提供后者所需要的“思想武器”,但却必然以牺牲或无视马克思思想中其他有价值的思想为代价。关于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史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比如,被当代西方左翼思想视为批判的靶子的前苏联体制本身显然就可被理解为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一种片面的现实化。而现在,西方左翼思想家们似乎又在思想上走向另一个极端。

问题在于,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思想家认为马克思思想是可以“拆解”的?关于这一问题,巴里巴尔的一个观点可被视为部分地给出了答案。在巴里巴尔看来,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无论是消灭私有财产,还是消灭各个国家人民的分割状态,都有着共同的基础,这一基础是由被彻底剥削、但同时又被排斥在他所处的资产阶级社会之外的无产阶级构建的,而正是在这一建构过程中,无产阶级实现了集体的主体化过程,这一过程“本体论地”植根于客观条件之中,并从根本上说具有否定性的特征,但是,

在今天人们之所以不再能这样来理解共产主义,其原因并不在于与无产阶级的存在相应的否定性,也不在于使得国家形式或一般的“共同体”得以巩固的那些表象的虚幻的或意识形态的特征,而在于那种认为财产批判和国家批判有可能自然而然汇合在一起、或彼此在本体论上相互彼此植根于对方的想法本身就是“否定性”的。^①

比岱基本上也是在这一路向上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念的:在他看

^① Étienne Balibar, “Remarques de circonstance sur le communisme,” in *Actuel Marx*, N°48, PUF, 2010, p.39.

来,马克思成熟时期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核心要点是,鉴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劳动与一般劳动的协调只有在“事后”才发生并由此引发一系列危机,因此要设想一种资本主义商品秩序被取代的可能性,而这一秩序被取代,就意味着采用一种在事前而不是事后起作用的“中介”即以集体劳动或被组织的劳动为前提,只有这样,个人劳动才能直接成为社会劳动,而由劳动的分工所带来的缺陷才能被克服;^①这样,按照比岱的看法,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为了克服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组织性”的缺乏而设想的替代性方案,而在当代社会中,这种“组织”要素已明确体现为资本主义的重要“一极”,因此马克思从“市场”推出“组织”的共产主义方案已不适用于今天。这就表明,在当代左翼思想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实际上被理解为只是一种经验性地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即19世纪中期的欧洲社会相匹配的思想,正因如此,前者才会认为,随着经验世界的变动,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的基础部分已无法适用于当代社会了,而只有其中的“政治反抗”(无论是对“国家”的反抗、对“资本”的反抗还是对“统治阶级”的反抗)维度才仍对当代社会具有理论意义。

这种对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解,表面上看似乎是合理的,却是以忽视马克思思想的内在的整体性为前提的。比如,巴里巴尔表面上将马克思的财产批判和国家批判视为一个整体,但实际上却将二者的统一视为经验性的,因而这种统一性会随着经验世界的变动而瓦解;比岱更是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视为对于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回应,而没有从马克思的思想整体出发理解其关于共产主义的思考。正是由于当代左翼思想家们总是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视为对于资本主义经验现实的某种回应,才会从不同的侧面来“提取”这种回应的价值维度,比如巴里巴尔和

^① 参见 Jacques Bidet, “Le communisme entre philosophie, prophétie et théorie”, in *Actuel Marx*, N°48, PUF, 2010, p.94。

比岱在马克思那里看到了“协作”，奈格里看到了“共同性”，而巴迪乌则看到了“平等”，等等。

事实上，如果从马克思一生的思想来看，共产主义问题始终与马克思的核心问题意识即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对于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问题的思考，使得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简单地基于某种经验现实而提出的观念或假设，而是体现了马克思试图从根本上把握资本主义时代的整体性问题意识，而无论“协作”、“共同性”还是“平等”，都只是这种整体性问题意识的具体体现。

二

从时间角度来看，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问题，无疑是马克思的“第一”问题。迄今为止人们所发现的马克思的第一篇思想性文字，是他中学时代所写作的一篇宗教考试作文，题为“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节至第14节论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这种结合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性和作用”。在这篇作文中，马克思就对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问题进行了思考。引起少年马克思思考的，是他所观察到的人所具有的有限性：

我们如果把自己的目光投向历史这个人类的伟大导师，那么就会看到，在历史上用铁笔镌刻着：任何一个民族，即使它达到了最高度的文明，即使它孕育出了一些最伟大的人物，即使它的技艺达到了全面鼎盛的程度，即使各门科学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它也不能解脱迷信的枷锁；无论关于自己，还是关于神，它都没有形成有价值的、真正的概念；就连伦理、道德在它那里也永远脱离不了外来的补充，脱离不了不高尚的限制；甚至它的德行，与其说是出于对真正完美的追求，还不如

说是出于粗野的力量、无约束的利己主义、对荣誉的渴求和勇敢的行为。^①

人在知识、信仰、道德和行动等方面的有限性,并不表明人不能对无限性领域或“永恒的东西”有所向往,恰好相反,马克思看到“人心中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渴望”。^②然而,对于“神性”、“善”、“知识”和“真理”等具有无限性的事物的追求,却往往被人自身所具有的致命弱点所妨碍,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欲望的火焰却在吞没永恒的东西的火花”。^③在少年马克思的心中,欲望显然无法通过人的自我努力加以克服,而是属于人的本性层面的东西,它使得人注定无法凭藉自身而达到自己对于无限物或永恒物的追求。但这并不表明人最终就无法通达无限性领域,因为“善良的创世主不会憎恨自己的造物”^④,他为了使人们变得像自己一样高尚,就派出自己的儿子基督拯救人类。基督本人的“道”是我们能够达到无限性目标的可靠保证。不过,对于少年马克思来说,人的得救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并不具有必然性,因为基督尽管为人带来道,但若人不能与基督结合为一体,仍然无法被拯救,因此人的得救还要靠人自身努力。人与基督相结合,其实就是认识和接受基督所秉持的“道”,而这里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并未将基督的“道”理解为玄虚之道,而是理解为与整个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联的“道”,也即在为人类而牺牲自己的行动中所展示的“道”。人认识和接受基督的道又意味着什么呢?马克思借用《约翰福音》中的比喻,将上帝比作“栽种葡萄的人”,将基督比作“葡萄藤”,将人比作“葡萄枝蔓”:人自然要崇敬上帝,“但是,葡萄枝蔓不仅会仰望栽种葡萄的人;如果它能有感觉的话,它会仅仅贴在藤上,它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9页。

②③④ 同上书,第450页。

感觉到自己与葡萄藤和长在藤上的其他葡萄枝蔓最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它会爱其他枝蔓，因为是同一个栽种葡萄的人照料着它们，是同一个藤身给它们以力量。”^①这就是说，对上帝之爱体现为与基督的结合，而与基督结合在一起又意味着与整个人类（马克思称之为“我们的弟兄们”^②）的最紧密的联结。如果说与基督的结合根本上就是循其“道”而行的话，那么个人与整个人类的“联结”，实际上就是要像基督那样为人类而牺牲自己。这样，对于具有“神性”的永恒之物的追求，最终被落实于为整个人类而牺牲，而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人才能拥有“摆脱了一切世俗的东西而成为真正神性的东西”^③的德行，才能变得高尚，才能获得真正使生活更加美好和崇高的快乐。

马克思把这种将“为整个人类牺牲”与“无限性”的联系在一起的思路贯彻在他关于职业的思考中。在他的著名习作《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思考》一文中，马克思在分析了青年面对职业选择时所会遇到的诸多实际困难之后，认为

如果我们把这一切都考虑过了，如果我们的生活条件容许我们选择任何一种职业，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使我获得最高尊严的职业，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一种能给我们提供最广阔的场所来为人类工作，并使我们自己不断接近共同目标即臻于完美境界的职业，而对于这个共同目标来说，任何职业都只不过是一种手段。^④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2页。

③ 同上书，第453页。

④ 同上书，第458页。

在这里“为人类工作”与“臻于完美境界”是密切相联的。马克思之所以并不认为人类幸福和个人的完美是相冲突的,是因为在他看来“人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①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就有着非常清晰的问题意识,这就是,人突破有限性而达到无限性的方式就是与整个人类的联结或为整个人类而牺牲自己。当然,我们不能仅根据两篇中学时代的习作就判定宗教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但无论如何,我们能看到,有限性和无限性如何能够统一(或有限的个人如何获得神性)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在马克思的思考中占据核心地位。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其说体现了少年马克思的崇高的道德感,不如说更多地体现了其神圣的宗教感。

马克思在大学阶段继续热切地探问无限性问题。马克思首先采用诗歌的形式来进行这一探讨。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大量诗歌,体现了马克思对于把握永恒之物的渴望,像“越过那晶莹闪耀的波浪/永恒的创造之神飞向远方/大千世界在涌动,无数生命在激荡/他环顾四周,永恒的空间无限宽广/他发出唤醒万物的神奇目光/用烈火铸成万千形象”^②这样的诗句,正是对有限性与无限性关系的形象描述。除了诗歌之外,在康德和费希特思想的影响下,马克思还试图建构一个法哲学体系,在这一体系建构过程中,他按照费希特的法哲学的方式建立起一套法的形而上学体系。不过马克思很快就意识到,这种“理想主义”必将遇到“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对立,以及“实体”和“形式”的分离,用这种探讨方式讨论法的问题,其结果将是法的精神及其真理的消失。于是马克思就经历了思想中的一次重要转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下,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页。

② 同上书,第695页。